

■热 点

# “黄金十年”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本报记者 行 超

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消费能力、精神需求的增长,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一个各项指标、各种统计数字均指向“井喷”的发展阶段。多年来,儿童文学界人士意气风发地谈论着“黄金十年”。近年来,不少媒体、出版人和专家、学者提出了打造中国儿童文学下一个“黄金十年”的说法。然而,刚刚过去的这个“黄金十年”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可供回味和珍藏的文学经典?还是仅仅留下了那一串串激动人心的数字、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出版神话?在今天,这样的问题也许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 何谓“黄金十年”?

进入21世纪的前3年,我国童书市场的成长性低于整个图书市场,成长中的童书出版积极寻求跨世纪的新繁荣新发展。2004年,我国童书出版开始发力,年产值增速达14%。而后,童书出版高歌猛进,“井喷式”发展,迎来了连续10年年均10%的超高速增长。

2013年8月21日的《中华读书报》刊发了2013年全国少儿图书交易会特刊“百问少儿出版黄金时代”,在策划缘起中,编辑陈香提出了“少儿书业的黄金十年”的说法。这篇报道广泛采访出版人、营销人、编辑阅读推广人等近50人,以100个产业问题,讨论“如何开启下一个‘金十年’?”此后,这一说法在众多少儿出版人、媒体人、作家、学者中广泛传开、反复援引,大家基本公认2004年至2013年为儿童文学发展的“黄金十年”。

事实上,在这篇报道出现之前,已有不少专家、学者敏锐地观察到了发生在儿童文学界的这场变革。2011年年初,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国纸质图书出版出现了发展趋缓、单本图书利润率下降、图书库存增大和实体店不断萎缩的局面,业内有人在《出版商务周报》头版发表文章,预判中国童书出版的“黄金时代”行将结束,“白银时代”即将到来。童书出版的发展前景和未来,引起了一些有关部门和整个出版界的关注。2011年年底,海飞将自己的调研结果撰写成《“最好时期”与“最激烈时期”》,从经典品牌长盛不衰、原创新书竞相发力、版权引进紧扣市场、跨界跨界新意迭出、行业竞争空前激烈5个方面,对2011年中国少儿图书出版作了述评。述评的最后预言:“童书出版,任重道远。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进程中,虽然童书出版的竞争会更激烈,但我国的童书出版一定会进入含金量更高的‘黄金时代’,一定会延续繁荣发展的‘美丽童话’,一定会大踏步地向出版强国迈进。”

方卫平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里也曾写道:“上个世纪90年代,儿童文学还在以自己的方式分担着整个文学界关于文学未来命运的焦虑,然而很快地,进入新世纪前后,在文学界对于文学‘边缘化’命运的集体焦虑中,当代儿童文学却迎来了它迄今为止最为兴盛的一个写作和出版时期。一方面,在儿童受众群体内,儿童文学的阅读量在迅速增加,儿童文学的传播圈也在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在图书市场上,各类销售数据统计一再确证了儿童文学在其中占据的显赫位置。儿童文学的这一勃兴势头体现在其

创作、出版、接受、传播等各个环节;同时,这一文类的艺术手法、风格等事实上也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拓展。因此,我认为,不论就外在的阅读接受还是内在的艺术探求而言,可以说,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都处在一个空前利好的发展时期。”

## 黄金出版还是黄金创作?

细细想来,本世纪初的那些年,其实不惟儿童文学,整个中国文学都非常活跃。在纯文学界,经历了先锋文学的转向以及“陕军东征”、“人文精神大讨论”等几个重要的文学事件,中国文学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变革。反观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虽然在数量上是繁荣的,但是在艺术品质上则是泥沙俱下,甚至是停顿和倒退。

回想上世纪80年代,在经历了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之后,中国文学和中国儿童文学都迎来了一个创作与出版的高峰时期。曹文轩、金波、张之路、郑渊洁等作家都是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并一步步被读者、学界接受和认可的。那个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作家们认真埋头写作,研究文本语言、追求题材多样化,在各种会议上,作家、批评家不断地思想交锋,彼此争论问题,为当时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养分,也为儿童文学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世纪以来,在经历了90年代一段短暂而黯淡的萧条期之后,儿童文学迎来了新的生机。以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为代表的一部分儿童文学作品,在小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几乎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儿童文学出版界开始渐渐认识并重视“畅销书”的打造与宣传。同时,这一时期恰好是国内读者消费力提高,对阅读尤其是孩子们的阅读越来越重视的阶段。各大出版社逐渐看到了儿童出版的广阔市场,于是,大量作家进校园、阅读推广人等新兴现象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出版制度的改革,将原本生活在体制内、捧着“铁饭碗”的出版社推向市场,出版的压力陡然间成倍增长。在这一形势面前,不少出版社将眼光瞄准热闹红火的儿童文学市场,几乎没有一家出版社不出版儿童文学相关书籍,儿童文学出版比重一度占据整个图书市场的三成左右。巨大的出版需求仿佛一个漩涡,将每一位作家吸入其中。面对巨大的经济诱惑和复杂的人情关系,已成名的成熟老作家邀约不断、应接不暇,成长期的青年作者迅速更新、逐渐膨胀,真正能静下心来打磨作品的写作者越来越少。

“黄金十年”中的儿童文学出版物固然存在精品,但不得不承认,还有一大部分作品质量参差不齐,泥沙俱下。正如陆梅所说,“出版业界比的是数字,高居不下的童书出版码洋,不意味着创作质量的同步提升,甚至反而是降低了写作的门槛,是对图书市场的跟风搭车、惟利图指标为上的姑息。”方卫平也看到,少儿出版业的井喷式发展对儿童文学创作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它既使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活动及其成果在出版、市场等领域受到空前热情的关注、尊重与鼓励,并且推动着当代儿童文学艺术在当

代的丰富化与多元化进程;另一方面,商业时代市场化、快节奏的出版逻辑,的确也给作家的创作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他进一步指出,这样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于市场利益的考虑,大量创作日益以迎合市场及儿童读者的娱乐需求为目标,由此导致了儿童文学艺术生态的失衡。二是在商业出版的节奏要求下,儿童文学创作的周期被一再缩短,作家没有更多时间来精打细磨一部作品,作品的艺术质量也就难以得到足够的保障。这不仅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问题,也是目前全球化商业出版背景下整个世界儿童文学共同面临的问题。上述的意见近年来在儿童文学界已逐渐成为共识,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儿童文学创作不仅要追求速度,更要追求质量和持久性。

## 质量参差 谁的责任?

在市场推动下造就辉煌的“黄金十年”,出版社功不可没。大量儿童文学书籍的创作和出版,成为我国儿童文学发



展的重要机遇。但与此同时,儿童文学作品的质量良莠不齐,出版社也难辞其咎。在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压力、考核要求之下,出版社只能一步步加快出版的脚步,在迎合巨大市场需求的同时不断将作家的写作周期缩短再缩短。出版社慢不下来,作者就很难慢下来;有情怀的大出版社慢了下来,反而给民营工作室和小出版社、出版机构留下了空间。在追逐利益面前,似乎所有人都难以扭转乾坤。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就这样简单地将责任完全推给出版社呢?

陆梅认为,这一问题不能简单推给出版人,或责难今日作家之怠惰。大量原创童书被推出的同时,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中国儿童文学:如何褒优贬劣,大浪淘沙,建立起一套成熟健全的筛选机制和艺术、审美的评价体系?年轻写作者如何不急于割裂、自成一个局面,踏上先行者筚路蓝缕蹚过的足迹,从而建立起清醒的历史意识和基本的世界观?我们又如何坚持有难度的写作,警惕步入自我的写作惯性,强调个性,注重观察力和原创力,慢慢拥有自己的声音,从而真正赢得中国读者和世界性读者的同步信赖?写作者自信满满当然好,但是倘若因视野所及有限,对自我的探索缺少纵



深的把握而不能用一个更为宽阔漫长的时间坐标来要求自己,身边的出版人和批评家又不能及时给予指点并作出历史的、艺术的和美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的话,那真是儿童文学的悲哀。



方卫平同样强调“大环境”中作家个人的原因。他认为,环境的改变非一时之力,目前的情况下,儿童文学创作质量的提升,可能要更多地依赖作家个人的自觉和努力。“我相信,每一个在内心深处真正认可自己为儿童文学作家的作者,一定希望自己的写作除了赢得市场的生计,也能赢得艺术的认可。其实客观地看,商业时代可能也为这种努力提供了另一类条件。我身边不少怀有真诚的艺术追求的儿童文学作家,在以若干作品赢得市场认可、进而获取相应的市场利益后,反而开始沉静下来,去思考和探求自我儿童文学艺术突破的路径。”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的保障恰恰为这种自由的探索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当然,对作家来说,这种探求不只是单纯尝试新的写作题材或写作风格,它还需要更多地与广泛、深入的作品和理论阅读及思考结合在一起。一个作家的写作经验及经济上的积累在市场环境中完成,那谁对阅读这样作品的读者负责?

多年来从事儿童文学出版工作的刘海栖注意到,国内童书出版存在着重要的误区,即童书中文学方面所占的比重过大,文学类书籍在全部儿童读物中占

据了四成以上的比例。在国外,童书出版尤其是针对小学到中学读者的书籍中,文学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此外还有历史、艺术、知识、科普等各个方面。在我国,家长对于儿童阅读的认识不够成熟,很多人是为了读而读,具体读什么却并不在意。此外,由于出版推广欠缺严格的标准,不成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儿童文学作品“扎堆”出现,其他领域的作者、翻译者欠缺,儿童文学因此也过多地面对着市场需求,承担着出版任务。他认为,长期这样下去,不仅不利于其他类型童书市场的发展,对儿童文学本身也是不利的。

一组值得注意的数字是,2004年,我国童书出版开始发力,年产值增速达14%。而后,童书出版高歌猛进,“井喷式”发展,迎来了连续10年年均10%的超高速增长。然而到了2012年,虽然童书出版还在增长,但同比增幅大幅下滑,降至4.71%,2013年甚至几乎低于4%。面对回调、盘整、转折,业界选择坚守和坚定。2014年,童书出版年产值增长10.26%,重回两位数。2015年,这一数字继续增长到15.63%。刘绪源分析到,出版的增长对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但反过来说,产业发展了,出版社有钱了,又能够做些好事了。这就是黄金十年的最后几年,儿童文学的纯文学创作得以重新发展的积极原因之一。不过,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谁来为这些发展和积累期的粗制滥造买单?

## 朝向经典的努力

不独是情感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文学也一样。中国儿童文学的上一个“黄金十年”已经过去,倘若恰如我们所期待,儿童文学真的能够迎来它的下一个“黄金十年”,对于这样的未来,我们是否该有不一样的期待?作为儿童文学的作家、批评家与出版人,我们应该对这一未来投入怎样的努力和改变?

刘绪源认为,面对近年来儿童文学创作质量下滑的局面,儿童文学界应从三方面进行反思和改善:一、作家自律,对自己提出更高的创作要求,争取写出真正的好作品,而不只是争取高版税高印数;二、批评界重振雄风,能够好好说好,坏处说坏,增强艺术批评,重视艺术分析,真正推动文学发展;三、各类评奖

一定要改变“黄金十年”中期自觉不自觉的“金钱第一”的倾向。要能真正推举优秀作品,认清文学性、艺术性和商业性并非同一概念,二者是有根本区别的。

对于新的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期待,理应是下一阶段中国儿童文学努力与发展的方向。与目前成人文学,尤其是纯文学出版领域相比,童书的出版市场基本稳定,读者细分市场明确,不断有适龄读者出现。因此,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有反复出版的价值的,一部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它的读者可能不仅是“70后”、“80后”,还有可能是“90后”甚至“00后”。正如曹文轩的经典作品《草房子》,出版18年,印刷超过300次,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会年年月月地不断走下去。当然,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一本《草房子》远远不够。作家们应该看到,努力认真写出一本具有经典价值的“长销书”,其意义和价值比写许多本很快就被人忘掉的“畅销书”要有意得多。

好在,目前已经有不少作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曹文轩获奖之后,有关儿童文学的美学价值被反复提起,重视语言的锤炼、情节的推敲、人物的塑造等创作基本问题被重新讨论。此外,海飞还观察到,中国童书在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正在发生5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童书出版格局分散、个头不大、实力不强的局面有了改观。同时,童书出版的专业化格局进一步强化。二是童书出版竞争模式的变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童书出版进入了“互联网+童书出版”和“童书出版+”的竞争生态。三是童书出版国际化,合作出书、合作办出版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创办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设立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大奖、走出国门构建“一带一路”童书出版平台,成果显著。四是图画书时代的到来,图画书也有了专业的、学术的研究中心。五是全民阅读,儿童优先。儿童阅读迎来了阅读的春天,亲子阅读、书香家庭、书香校园、书香社会蔚然成风。他认为,5个新变化表明,中国童书出版正在经历着以转型升级、注重质量为目标的新阶段。

正如陆梅所说,文学的本质是慢,倘若以慢的耐心,是否会“等出”一部部朝向经典的畅销作品?我们都应该有欠缺毋滥的写作精神和出版精神。如此,中国儿童文学真正的黄金期才可预期。



## 京城胡同儿

提起老北京人的生活,就不得不联想起京城的胡同儿,这些胡同儿承载了太多的内容,可以说就是京城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的缩影。胡同儿里有达官显贵,也有平头百姓。寻常百姓的柴米油盐与仁人志士的鸿鹄大志,会在此奇妙地共生。

前段时间看到一本儿童绘本《一辆自行车》,书名很有趣,题写的字体也拙朴、别致,在浅米色的护封上显得赫然、清爽。一辆墨绿色的自行车,被画在了封面的中央,那模样儿看起来既熟悉又亲切。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它再熟悉不过了,这是当时邮递员们的专属座驾,就像摩托车中的“哈雷”,属于重型的车子,承载量大且坚固无比。

这本书的作者是于大武先生。大武是老北京,创作过不少以北京为题材的作品。他熟悉、了解北京,所以他的作品中会弥散出浓浓的京味儿和对京城的爱意。

我用了半个多小时,看完了这本只有三十几个页码的书。之所以读得不快,是因为很多画面都会吸引我仔细地看上一阵子。我眼睛盯着书页,脑子里则在回想:

“那片儿房子是这样的吗?那条街道是这个走向吗?”

这本书的构思实在是精妙,看似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他小时候偷骑自行车的故事,而其更深的用意,是要通过自行车在胡同中的骑行路线,把儿时的家和周遭的景象展现给我们,以此表达对逝去岁月的追忆。

我拿起电话打给编辑,希望她能尽快安排我与大武先生见个面,因为书中的很多细节,让我充满了好奇,迫不及待地等着他来答疑解惑。

还是那家老字号,还是那几样家常菜。虽然大武先生滴酒不沾,但一聊起老北京、一聊起胡同儿、一聊起儿时的趣事,还有大家钟爱的艺术,那温暖的氛围已经让在座的人微醺了。

“您小时候是住在安定门那片儿吧?”“是啊。就住在安定门大街路西的胡同儿里。”

“那一片儿的胡同儿可不老少啊。”“可不是吗!顺嘴就能数出来,分司厅胡同儿、车棒店胡同儿、国旺胡同儿、北下

洼子胡同儿、东公街胡同儿、柴棒胡同儿、谢家胡同儿、中缘胡同儿……”

“您的画里有个细节,就是把自来水管子安置在胡同儿里。记得小时候我住的那个大杂院,水管子可是装在院子里的。”

“您说的那已经是后来的事儿了。50年代的时候,自来水管子是装在胡同儿里的,有的小胡同儿还没有。为了存水,家家户户都得备一两个大水缸。到了冬天就更麻烦,想用水,邻居们得提前约定,先用烧热水或点火加温的方法,把水管子里的冰化开才能接到水。想当年用点儿水还是挺费劲儿的,所以那时候,大伙儿都很珍惜水,一盆水可以干不少事儿呢。”

“您小时候住过的房子现在还在吗?”“还在。我画这本书的时候,有些细节记不清了,我就会骑上自行车去兜一圈。”

“书里写,您家的院子里有个小茅厕,这在当时是挺稀罕的,印象中那时的厕所都在胡同儿里,而且是公用的。”

“没错!大多是这样的。不过有些大点的院子也会搭个简陋的小茅厕,有些连顶棚都没有,晴天还好,要是赶上个雨雪

天儿,上个厕所可就糟心喽。”

“于老师,远处的建筑是雍和宫吗?当时的鸽舍都是放在房顶上吗?那时院子里都有什么树?家家种什么花儿?孩子们除了玩您画的这几种,还会玩哪些游戏?夏天时家家都在院子里吃饭吗?院子门口的那两座石鼓是做什么用的?”……

趁着我啃着猪蹄儿的空儿,陪同的编辑机关枪似的又提了一大串问题,看来大武先生的饭是吃不踏实了。

这顿饭吃了近4个小时,大家话题始终没有离开过这本书,没有离开过这本书的素材——大武先生儿时的乐园——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附近的胡同儿。

60多年前,大武先生曾在北无拘无束地成长,60多年后,大武先生用妙笔为我们再现了那个年代的市井生活,看着这些画面,我仿佛感到了7月的骄阳洒在肩头的灼热;浓荫下微风拂面的快意,嗅到了似雪槐花的幽甜;邻家后窗飘出的肉香,还有邻家姐姐缠系在辫子上的漂亮的玻璃丝头绳。

这就是胡同儿的魅力,每一个在这里长大的北京人都对它有深深的眷恋。只要一聊起胡同儿,就会有叙不够的旧,诉不尽的情。这份情怀就似封存多时的陈酿,越久越纯,让人魂牵梦绕。 缪惟 文/图